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東德共黨政權崩潰之原因

doi:10.30390/ISC.199312_32(12).0005

問題與研究, 32(12), 1993

Wenti Yu Yanjiu, 32(12), 1993

作者/Author：費偉

頁數/Page：45-6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3/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312_32\(12\).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312_32(12).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東德共黨政權崩潰之原因

費 偉

(德國薩爾蘭大學中國與
東亞問題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冷戰時代超級大國的對峙，產生了四個國家的分裂，如今越南和德國已經重新統一。其中奉行社會主義的北越，雖然在軍事方面的優勢戰勝南越，統一了越南；但是若以和平方式作競爭，社會主義政體也被證實是蠻脆弱的，因為只在短短的兩年，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就消失了。Jan Rowinski 指出，雖然，對於中歐、東歐所發生的事件，區域問題的專家早已預期可能發展到某種程度，可是萬萬沒有料到整個事件發展的動力之大、速度之快、規模之廣，都遠遠超過他們原先的預測。^①這種說法特別合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情況。

一九八九年還有觀察家指出東德的政體很穩定，^②但是從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 (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 社統黨)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八日一開始所謂「政策轉折 (Wende)」後，社統黨的政權就開始跌跌撞撞地崩潰。一九九〇年三月十八日提前舉行的國會選舉，主張德國快速統一的「德國聯盟 (Alliance for Germany)」獲得四八%的選票，重建的社會民主黨獲得二二·九%的選票，而改變名稱的社統黨 (現在稱為「民主社會主義黨」) 只獲得一六·四%的選票。(參見表一) 此次選舉結束了社統黨四十年來的政權，而由德國聯盟與社會民主黨組成聯合政府。

一九九〇年七月一日兩個德國為了停止東德人民流往西德，實施了經濟、貨幣和福利聯盟；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重建的五個東德邦，都根據西德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成為德國聯邦之一員。

註① Jan Rowinski,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Origins and Prospects," in Lin Bih-Jaw, ed. *The Decline of Communism: Causes, Process, and Prospects*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991), p. 1.

註② Stephen F. Larrabee, "From Reunification to Reassociation," in Stephen F. Larrabee, ed., *The Two German States and European Security* (N.Y.: St. Martin's Press, 1989), p. 13.

從東德政權解體之快速，且全程未曾引發暴力事件的過程來看，東德社統黨早在一九八九年秋，就已經失去了它內部的凝聚力。問題在：為什麼政治學者事先沒有分析出這個全面的不穩定？事實上，整個東德的崩潰過程，政治學者所提出的國家統一方案，都被實際的事實遠遠地拋在腦後。③我們可以說，德國到現在都還搞不清楚，自己是怎麼統一起來。這樣的快速統一，造成許多經濟、政治與心理方面的緊張。

目前世界上殘存的社會主義國家很少，但是由於即使是像「德國模式」這樣的和平統一，也會造成國家的災禍，因此北韓與中共的政權穩定與否，對南韓和中華民國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本文嚐試對東德的情況提出一些回顧和檢視，俾使尚未解決國家統一或獨立問題的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穩定程度的關注，具有實踐上的參考價值。

文章中首先分析東德政體的存在條件，接著探討這些條件在東德崩潰前十年，有些什麼樣的改變，並在第三部分試著分析哪些因素和事件，使東德的崩潰發生在一九八九年。

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存在的基本條件

以一九四九年西德和東德立國的生活情況、語言和文化來看，兩者間並無重要差別，因此需要以另外的標準作為雙方政體的辯解。

註③ Jochen Thies and Wolfgang Wagner, eds., *Das Ende der Teilung* (Bonn: Verlag fuer Internationale Politik, 1990).

表一：1990年3月18日東德國會選舉的結果

政 黨 名 稱	有 效 票	%
基督教民主聯盟 (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 a b	4,710,589	40.8
德國社會聯盟 (Deutsche Soziale Union) a	727,730	6.3
民主新頁 (Demokratischer Aufbruch) a	106,146	0.9
德國民主社會黨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2,525,534	21.9
民主社會主義黨(以前的社統黨)(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b	1,892,381	16.4
自由民主聯盟 (Bund Freier Demokraten) b	608,935	5.3
聯盟“90年”(Buendnis '90)	336,074	2.9
德國民主農民黨 (Demokratische Bauernpartei Deutschlands) b	251,226	2.2
綠黨 (Die Gruenen)	226,932	2
德國民族民主黨 (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b	44,292	0.4
其他的黨派	111,307	1

說明：a：“Alliance for Germany” b：1989年9月之前已經存在的黨。

資料來源：EIU Country Report, East Germany, no. 2 (1990), p. 9.

國際因素

毫無疑問的，德國的分裂是冷戰時期美蘇對峙所造成的。但是西德在西方國家中，很快地就成爲一個具有相當自主權的同盟者，而蘇聯卻把東德看成它的戰利品。

由於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了重大的損失，因此他們一定要從他們的德國占領區中獲取資源，作爲回復蘇聯經濟與發展軍事力量之所需。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東德工人舉行反共暴動後，蘇聯才縮減他們要求東德交貨的規模。

四十萬蘇聯軍隊的進駐東德，以及蘇聯對東德全面的領導要求，一方面提供了社統黨執政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也使東德長期扮演服從者的角色。

一九五〇年在東德，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和波蘭，一九六八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蘇聯的領導人都明白宣示，東德不可能有任何蘇聯所不允許的政變出現。這種沉鬱的威脅，也鞏固了東德社統黨的政權。

此外，東德也需要借助蘇聯的協助，才有可能突破西德的外交封鎖。如一九七三年，蘇聯以其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身份，才使東德以兩個德國的模式，進入聯合國。

在未得到國際間普遍承認的同時，東德因爲與其他東歐國家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係，使他具有類似主權國家的地位。也就是說，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爲它的成員國，提供了一種相互間的合法性。除了這種心理因素外，社會主義陣營間的相互關聯性也很重要。例如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東德爲了防止他的人民流往西德，宣佈封鎖他與西德和西柏林的邊界。此時東德即需仰賴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協助，以免東德人民取道他國。

經濟發展與民心之關係

Stephen White 指出，當共產政權逐漸喪失個人魅力或革命傳統的合法基礎時，應以福利措施來造成所謂的「社會經濟合法性」(social economic legitimation)。^④換句話說，這些政權應使他們的人民相信，目前的生活情況與政府所答應的發展還是值得保留的，因此以反對行動作爲改善生活的冒險行爲是不值得的。如果以經濟概念來說明，就是共產黨應該努力使人民反對行爲的機會成本 (opportunity cost) 變高，這樣他們的政權才能使人民對他們的統治產生「值得服從」(obediencworthiness) 的信仰。^⑤

註④ Stephen White,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Communist Legitimacy," *World Politics*, Vol. 38, No. 3 (April 1986), p. 463.

註⑤ *Ibid.*, p. 462.

社統黨主要是憑藉蘇聯軍隊的支持而非因革命而取得政權，因此社統黨不得不以經濟的成就作為本身政權的辯解。第二次世界大戰與蘇聯占領初期，東德經濟雖遭受慘重損失，但是由於戰前高水準的生活經驗，使東德居民在做生活比較時，不以其他東歐國家而以他們的西德弟兄作為比較的基準。一九五三年，東德領導人忽略了這個事實，而遭到幾乎使其政權覆亡的工人起義。此後，東德領導人無時敢忘人民的福利利益。

評估五〇年代東德的經濟，必須注意兩個問題：一、當時東德處於經濟恢復期，經濟發展的速度相當快，他們的經濟情況比戰爭時期或投降初期有明顯的改善。二、對社統黨經濟成就不滿意的人民大量移往西德，直到東德封鎖了他與西德的國界，社統黨才完全控制了東德的經濟生活。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七年，東德實施了較具彈性的「新經濟制度」(Neues Oekonomisches System)，為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動力，其成就雖較西德的「經濟奇蹟」遜色，但也確實提高了國內的生活水準。^⑥

一九七一年，社統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中，進一步將「經濟與福利政策的協調」作為黨的核心政策。其內容在使「人民的物質與文化水準，保持在高速發展的經濟基礎上，不斷提昇。」^⑦它的具體表現是價格穩定、薪水提高、增建住宅計劃、協助新婚夫婦與母親的福利。社統黨希望可以借此抵消西德高消費的生活水準對東德人民帶來的引誘力。七〇年代末期，「經濟與福利政策的協調」獲得表面的成功，因為人民真的感覺到生活情況改善了。^⑧

東德在意識形態上的自我了解

George Schoepflin 指出，在共產主義下意識形態的功能是：一個政權的統治精英不但以暴力、或以使用暴力的威脅來保持他們的政權，更重要的是，他們提供一個預示未來的幻景。此幻景足以使他們為自己和自己的行為提出辯解。^⑨這種意識形態上的未來性，為這個政治體系提供了某種程度的內聚力與穩固性。^⑩

無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儘量強迫東德社會，使得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占上風。但是除了蘇聯的壓力外，還有

註⑥ Bruce Allen, *Germany East, Dissent and Opposition*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91), p. 55.

註⑦ Hans-Hermann Hertle, "Der Weg in den Bankrott der DDR-Wirtschaft," *Deutschland-Archiv*, Vol. 25, No. 2 (1992), p. 130.

註⑧ Michael Kasner, "The Economic Dimension," in Edwina Moreton, ed., *Germany between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32.

註⑨ George Schoepflin, "Das Ende des Kommunismus," in Jochen Thies and Wolfgang Wagner, eds., *Das Ende der Teilung* (Bonn: Verlag fuer Internationale Politik, 1990), p. 71.

註⑩ *Ibid.*, p. 70.

一些條件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傳播：第一、納粹德國無條件投降後，德國社會陷入嚴重的道德危機，在價值體系崩潰的情況下，有利於新教義的傳播。尤其是當時的占領軍有意防礙其他概念的出現和流傳。第二、社會主義的成功。當時蘇聯不但打敗了納粹德國，而且在戰後快速的突破美國核武的獨占局面，共產黨並在中國大陸獲得勝利。似乎世界上沒有力量可以阻礙社會主義制度的擴張，事實似乎已經證明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優越性，因此敢出面否定社會主義先進功能的人很少。

東德的領導人一直希望能使他的行政與技術方面的知識份子明白擁護蘇聯，雖然這項努力沒有成功，但是至少大部份的知識份子起碼都容忍了社統黨與蘇聯的親密關係。社統黨視自己的政權與蘇共密不可分，^⑩因此蘇聯的勝敗對社統黨的合法基礎有直接的影響。

此外，社統黨對德意志民族問題的態度在六〇年代末期，也有了重大的改變。

一九七〇年以前，社統黨認為東德的政權遲早要擴大到全德國，一九六八年通過的東德「社會主義憲法」也保留了一個全國德意志民族的概念。^⑪但從一九七一年起，東德開始對西德進行一個「界線政策」(Abgrenzungspolitik)。強調西德「資產者的德意志民族」與東德「社會主義的德意志民族」有社會制度的差別。^⑫

內政的穩定

社統黨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建立柏林圍牆前，政權並未獲得穩定。^⑬一九五三年東德工人起義，遭受蘇聯軍隊鎮壓後，雖然未再發生反社統黨的大示威或其他公開反對行動，但是東德居民不斷地移往西德，卻使東德的勞動力不斷喪失。據統計，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六一年共有三百萬人離開東德。^⑭

一九六一年柏林圍牆建立後，東德的統治者才開始可以有效發揮他巨大的安全體系的威力。社統黨獨占了社會上所有的財源與事業途徑，並且幾乎可以全面控制反對者的未來。社統黨不但可以封鎖一個反對者的行動，也可以排斥反對者的事業。六〇年代與七〇年代初，反對者在這麼嚴密的控制下，反對行動大幅度地縮小了。

以林茲 (Juan J. Linz) 提出的三種反對標準來看，一九五三年工人起義後的東德反對形態如下：

註⑩ Renata Fritsch-Bournazel, *Confronting the German Question, Germans on the East-West Divide* (Oxford: Berg, 1989), pp. 52f.

註⑪ *Ibid.*, p. 98.

註⑫ *Ibid.*, p. 99.

註⑬ Allen, *Germany East. Dissent and Opposition*, supra note 7, p. 54.

註⑭ Fritsch-Bournazel, *Confronting the German Question*, supra note 11, p. 105.

(一)、非法反對 (illegal opposition)：以政治性示威或暴力手段，意圖推翻現有政權。¹⁰這種反對因東德極其嚴密的政治控制，並不存在。

(二)、準反對 (alegal opposition)：據林茲的定義，準反對係針對政權的政治機構，以及在一定幅度內社會和經濟結構的基本改變。¹¹準反對的反對者雖然對政權不忠誠，但是卻不至於採取非法的手段來顛覆政府。¹²東德的準反對者採取與執政者不同的價值體系來表示他們的異議，其中最明顯的有下列幾種：

1. 宗教。東德最重要的基督教擁有本身的組織機構，且有本身的財源，並接受西德基督教的幫助，使社統黨不得不容忍宗教的有限主權。社統黨嘗試以公開的壓力、高層宗教人士的賄賂、派遣線民等方式來影響宗教。宗教則希望能爭取到較大的行動空間、降低國家對信教者的歧視待遇、容許有關人道的個人問題的解決。社統黨希望斷絕東德基督教與西德基督教組織上的聯繫，所以一九六九年七月十日產生了獨立的「東德教會聯盟」(Kirchenbund der DDR)。¹³爲了進一步得到基督教領導者對東德政權的公開支持，社統黨總書記何內克(Honecker)與主教 Schoenherr 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會晤時，正式允許基督教主持自己的教育機構、運用大眾媒體、從西德輸入宗教性的資料等。¹⁴

雖然宗教的高層領導人爲了保持宗教有關的利益，避免與社統黨產生激烈的對峙，但是基層牧師卻是真正反對派的核心人士，地方教會也是反對者最重要的集會場所。一九七六年的 Brusewitz 牧師、一九七八年的 Gunther 牧師甚至在反政權的示威中，舉火自焚。¹⁵

2. 黨外知識份子，特別是文化知識份子的反對。七〇年代他們的主要訴求是人權方面，如釋放政治犯、允許言論自由與旅行自由。¹⁶他們平常在宗教組織的保護下活動。初期他們的影響較小，但是當社統黨鎮壓這些社團時，激使其他的人聲支援。例如一九七六年十一月 Wolf Biernann 被逐出境時，就有很多文化界代表公開地批評社統黨。¹⁷

¹⁰ Juan J. Linz, "Opposition in and under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ase of Spain," in Robert Dahl, ed., *Regimes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87.

¹¹ *Ibid.*, p. 219.

¹² *Ibid.*, p. 220.

¹³ Allen, *Germany East. Dissent and Opposition*, supra note 7, p. 49ff.

¹⁴ *Ibid.*, p. 52.

¹⁵ *Ibid.*

¹⁶ Fred Odenburg, "The Decline of Communism in the GDR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in Lin Bih-Jaw, ed., *op. cit.*, p. 61.

¹⁷ Allen, *Germany East. Dissent and Opposition*, supra note 7, p. 66.

(三)、半反對 (semi-opposition)：據林茲的定義，這種反對是由那些在統治團體中不占上風或沒有代表的團體所組成的。他們樂於參與權力，但又不向政權的本質挑戰為原則。^②半反對者基本上還是對社會主義保持忠誠，只是對社統黨的政權提出批評。這些半反對者以黨內的知識份子為主。六〇年代與七〇年代間，東德社會中具有影響力的半反對者有 Robert Havemann、作家 Stefan Heym 和 Christa Wolf、與 Rudolph Bahro。其中 Robert Havemann 與 Rudolph Bahro 因為公開挑戰社統黨的政策，並進一步表示支持「歐洲共產主義」(Eurocommunism) 的概念，所以遭受慘重的制裁。^③ Christa Wolf 跟 Stephan Heym 雖然也對社會和黨內民主的缺失提出批評，但是原則上並沒有對具體政權模式的合法性提出懷疑，而且有時候還會對社統黨表示他們的個人忠誠，^④所以也可以稱他們為假反對者 (pseudo-opposition)。^⑤

三、八〇年代之挑戰

社會主義陣營的全面危機

七〇年代，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脚步慢了下來，^⑥但是共產政權還是得以貸款方式對人民隱瞞這個事實，八〇年代初期，因為下列三個因素，使這些國家經濟履行的缺失暴露出來：

一、一九七三年與一九七九年石油價格暴漲，使燃料與貨品的進口價格大幅提高。

二、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二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使西方國家的市場競爭尖銳化，導致社會主義國家出口能力瓦解。

三、經濟危機也使國際金融市場的利息大幅提高。^⑦

這些因素使得波蘭、匈牙利與羅馬尼亞的償債能力崩潰。^⑧

東歐國家中，波蘭最早出現政治危機。一九八〇年波蘭發生的事件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拉開序幕，因為即使波蘭的統

^② Linz, "Opposition in and under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upra note 17, p. 191.

^③ Allen, *Germany East. Dissent and Opposition*, supra note 7, p. 62 and p. 70.

^④ *Ibid.*, p. 66.

^⑤ Linz, "Opposition in and under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upra note 17, p. 192.

^⑥ White,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Communist Legitimacy," supra note 5, p. 464.

^⑦ Joerg Roessler, "Der Einfluss der Aussenwirtschaftspolitik auf die Beziehungen DDR-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Archiv*, Vol. 26, No. 5 (1993), p. 560.

^⑧ *Ibid.*, p. 561.

治者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宣佈戒嚴，波蘭政權也無法持久地鞏固。^②
波蘭危機最明顯的教訓是，蘇聯老大哥已經無法解決他附庸國的問題，因此從此刻起，「逃命吧！」的口號取代了以往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精神。每一個共產黨都開始自找出路，尋求解決自己政權面臨的經濟與政治危機。這使社會主義國家的同盟趨於解體。

蘇聯經濟潛力的瓦解固然是計劃經濟內在因素的結果，^③一些政治性因素對經濟的衰退速度也有所影響。例如布里茲涅夫（Brezhnev）時代後期，黨領導人明顯的老年癡呆導致政治決策的錯誤（如進駐阿富汗）、拒絕承認實際存在的問題、行政與黨機構紀律的瓦解、以及因中央停止決策而導致社會出現全面性的停滯。^④八〇年代戈巴契夫之前，只有安德洛波夫（Andropov）實際對蘇聯面臨的問題作出決定，但是他統治的時間太短，所以對蘇聯的狀態無法產生持久的影響。^⑤

戈巴契夫當上總書記後，嘗試先以傳統的運動方式（所謂「Uskorenie」）來改善蘇聯的經濟，但是這個作法失敗了，蘇聯人民對他的經濟權能喪失信任。^⑥一九八七年戈巴契夫推動了所謂的「開放」（Perestroika），這才是實際的改革。儘管國外的觀察家都稱讚戈巴契夫的「新思維」對世局緩和的貢獻，但是他在內政上的混亂實在不容忽視。經濟方面，一九八七年的「國家公司

表二：蘇聯經濟的成長率1985~19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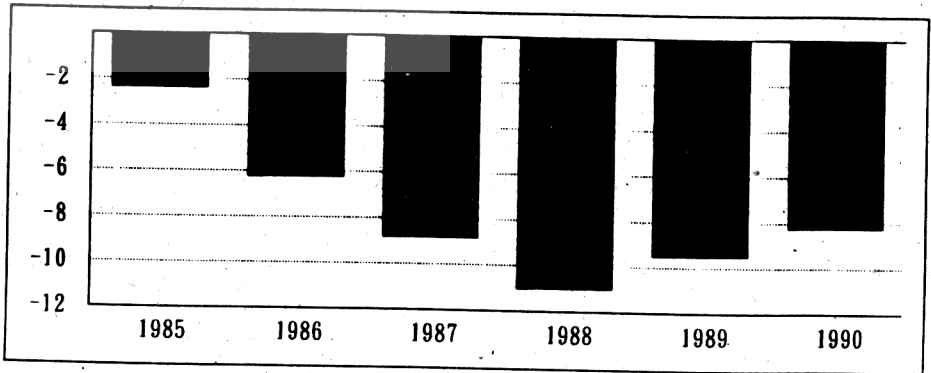
	1976~ 80	1981~ 85	1986~ 89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est.)
國民物質生產 (NMP)	4.3%	3.2%	2.7%	2.3%	1.6%	4.4%	2.5%	-4.0%
工業	5.1%	3.9%	4.2%	5.5%	4.6%	6.3%	0.4%	-
農業	-0.2%	1.0%	2.4%	7.1%	-1.4%	2.5%	1.7%	-
建築業	3.1%	3.2%	6.6%	12.1%	5.5%	7.6%	1.6%	-
交通運輸業	3.8%	2.9%	0.8%	4.2%	0.3%	5.8%	-6.5%	-
私人消費	4.2%	2.9%	3.4%	1.9%	2.7%	3.9%	5.3%	3.0%
淨固定投資	2.6%	-1.7%	-1.1%	4.9%	5.7%	-7.4%	-6.7%	-20.0%

資料來源：IMF / World Bank / OECD / EBRD, *The Economy of the USSR*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1990), p.4.

註① Schoepflin, "Das Ende des Kommunismus," supra note-10, p. 71.
 註② Barbara Krug, "Blood, Sweat, or Cheating: Politic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ist Economies in China, the USSR, and Eastern Europ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24, No. 2 (1991), p. 138f.
 註③ Robert L. Hutchings, "Leadership Drift in the Communist Systems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22, No. 2 (1989), p. 7.
 註④ Marshall I. Goldmann, *What Went Wrong with Perestroika?* (N.Y.: W.W. Norton & Co., 1991), pp. 64f.
 註⑤ *Ibid.*, p. 94.

表三：蘇聯預算赤字1985~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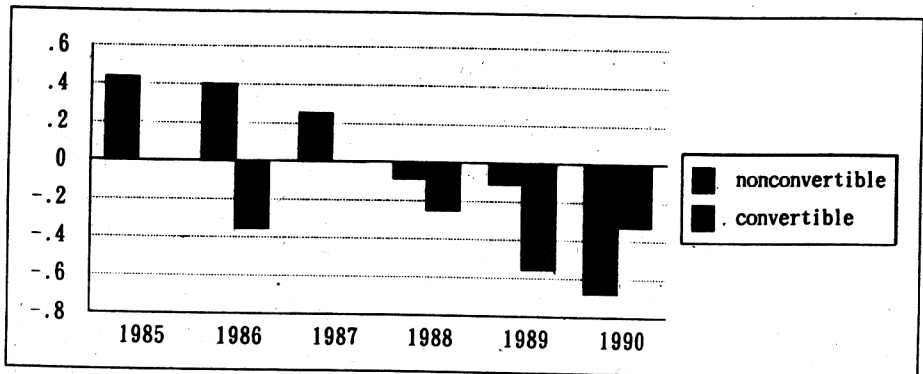
(占 CDP 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IMF / World Bank / OECD / EBRD, *The Economy of the USSR*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0), p. 5.

表四：蘇聯外貿情況 1985~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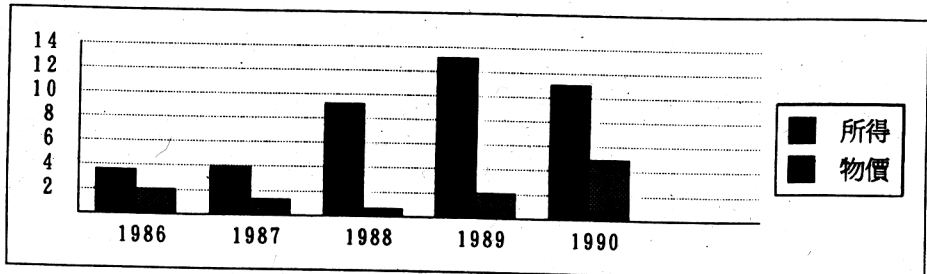
(占 CDP 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IMF / World Bank / OECD / EBRD, *The Economy of the USSR*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1990), p. 5.

表五：蘇聯人民所得與物價表，1986~90年

(年增率)



資料來源：所得... Gerhard Simon, ed., "The Soviet Union 1990 / 91 Crises-Desintegration-New Orientation," *Berichte des Bundesinstituts fuer ostwissenschaftliche und internationale Studien*, special issue (February 1992), p. 3.

物價... IMF / World Bank / OECD / EBRD, *The Economy of the USSR*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1990), p. 6.

「導致經濟聯繫的崩潰。」^④據表二所示，一九八八年是經濟成就最好的一年，但是從表三到表五，可以看出一些很大的不平衡。從消費者立場來看，戈巴契夫的政策並未使消費品的供給改善，反而使消費品的供給不足日益嚴重。

一九八八年戈巴契夫推動的政治體系改革帶來民族衝突的副作用。因此可以說，戈巴契夫推動的改革不但沒有達成鞏固蘇聯政體的預期目標，反而使他實際控制的經濟、政治潛力趨於縮減。

社會福利政策之成就成泡影

雖然東德的社會福利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最發達的，但是八〇年代初期，東德依舊遭遇此項問題。原則上，黨的領導者並非不明瞭從一九七三年起，東德的經濟力根本不足以同時推動軍事建設與福利措施。^⑤但是為了保持「經濟與福利政策的協調」策略與一九七六年開始的微電腦計劃，^⑥社統黨採取兩項措施來籌措財源：一、長期容忍與西方國家的貿易逆差。換言之，向西方國家貸款。一九七八年東德累積的債務已經迫使東德為了清償利息而貸款。^⑦二、減低東德的投資比率。從一九七一年的一九·四%到一九八九年的七·四%。^⑧三、將投資集中在領導人所宣佈的「主要經濟計劃」上。此一作法造成「非主要」經濟部門的落後與設備的過度耗損。以致八〇年代末期，建築企業有四〇%的設備都需要汰舊換新。^⑨

由前節所述的情況可知，一九八一年與八二年東德勉強可以避免無償債能力的窘境。^⑩當時蘇聯不但拒絕提供如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八年與一九六〇年的經濟援助，^⑪並且更進一步減少兩百萬公噸的石油供給（一九八一年的一九〇九萬公噸減至一九八三年的一七〇五萬公噸），^⑫此一危機造成東德明顯的生活困境，一九八二年秋天就爆發了「奶油危機」，約有三個月的奶油和香腸供應不足。但是一九八二年後，東德還是能夠暫時恢復有償債能力的信用。這個暫時的輕鬆，是依賴西德的援助與生產設備的超量使用。一九八三年與一九八四年西德政治家 Franz-Josef Strauss 動員了二十億馬克的貸款援助

^④ *Ibid.*, p. 140.

^⑤ Hans-Hermann Hertle, "Staatsbankrott. Der oekonomische Untergang des SED-Staates," *Deutschland-Archiv*, Vol. 25, No. 10 (1992), p. 1028, note 25.

^⑥ Roessler, "Der Einfluss der Aussenwirtschaftspolitik auf die Beziehungen DDR - Bundesrepublik," *Supra* note 30, p. 560.

^⑦ *Ibid.*, p. 561.

^⑧ Hertle, "Der Weg in den Bankrott der DDR-Wirtschaft," *supra* note 8, p. 130, note 15.

^⑨ Juergen Becher, "Das Ringen und die Wirtschaftsreform in der DDR," *Deutschland-Archiv*, Vol. 23, No. 5 (1990), p. 687.

^⑩ Roessler, "Der Einfluss der Aussenwirtschaftspolitik auf die Beziehungen DDR-Bundesrepublik," *supra* note 30, p. 561.

^⑪ *Ibid.*

^⑫ Kasner, "The Economic Dimension," *supra* note 9, p. 132.

東德。^⑤但是東德最基本的經濟策略並未改變。從東德人民的立場來看，一九八二年後，東德生活水準的發展已經停滯了，而西德卻大幅進展。社統黨提供的社會福利政策在西德都有，而東德消費水準低於西德卻是不爭的事實，^⑥東德人民對此頗不耐煩。

八〇年代後半，東德的經濟終於失去任何活力，所謂的國家計劃連參考價值都沒有，因為中央計劃機構已經無法平衡任何的國家計劃。一九八七年的新年，許多工廠沒有收到本廠的年度計劃，計劃到二月底才來。一九八八年的年度計劃甚至到八月才做好。^⑦東德的經濟已經是精疲力竭了。

社統黨對戈巴契夫「改造」政策的反應

一九八五年，忠誠擁護共產黨政權與蘇聯的東德知識份子，熱烈地歡迎戈巴契夫當上蘇共總書記。他們希望較年輕的戈巴契夫能夠克服七〇年代以來社會主義的僵化。因為對身負執行任務的知識份子而言，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缺點與挫折非常明顯。他們即使因為領導階層有意的隱瞞而不知道全面的制度問題，但是他們卻在天天的工作中發覺發展速度的減緩。即使是那些不贊成共產意識形態的專業知識份子，也會以專家身份討論這些問題。只是這些專家爲了不願被稱爲異議份子或反社會主義者，可能會住口不言，但是內心的不滿還是存在的。

知識份子之所以注視著莫斯科，是因為他們知道，除非莫斯科推動開放，否則一九八六年之後，其他的共產黨不敢進行深度的改革，因此社統黨內的知識份子像他們的東歐同志一樣，把希望放在戈巴契夫的身上。但是社統黨的領導人卻儘量防止黨內自發的政治討論，這樣保守的態度自然引起黨員的不滿，可是領導者卻有其邏輯存在。

George Schoepflin 指出，知識份子應該以其說服力來支持政權。因知識份子扮演統治者的鏡子角色，如果他們開始反映對統治者更爲不利的真實，將把統治者搞糊塗，這種糊塗的心理傳到政治體系內，會使執政黨因爲自我懷疑而告解體。^⑧社統黨似乎有意或無意地懼怕這個情勢。所以他們對「改造」的反應才會這麼敏感。

首先，社統黨對「改造」的「公開化」(glasnost)有激烈的反應。他們不願公開討論制度面臨的問題，因爲他們如果公開討論的話，一、他們得承認現在政策的失敗。可是何內克(Honecker)把「經濟與福利政策的協調」看成他個人對社

註⑤ Roesler, "Der Einfluss der Aussenwirtschaftspolitik auf die Beziehungen DDR-Bundesrepublik," supra note 30, p. 565.

註⑥ Becher, "Das Ringen um die Wirtschaftsreform in der DDR," supra note 42, p. 687.

註⑦ 據筆者認識的中層經理談話所得結論。

註⑧ Schoepflin, "Das Ende des Kommunismus," supra note 10, p. 71f.

會主義理論的貢獻。二、他們知道任何政策調整的第一步是經濟能力與生活水準的調整。此舉必然大幅降低人民的生活水準，以一九八〇年代末期的情況來看，大約降低二〇～三〇%左右。^④當然沒有人願意負這樣的政治責任。三、經濟發達的西德就在旁邊，他們怕積累問題的討論會瓦解為自己政權辯解的基石，所以東德領導人寧願以「沒問題」、或是「你的鄰居如果換了他的裱糊紙，你也一定要嗎？」的說法來搪塞。^⑤

「改造」政策第二個很使社統黨敏感的部份是對歷史的重新辯論。社統黨的領導者怕這個辯論會「洩露」社會主義的歷史恥辱。這種恥辱會引起對蘇共政權的懷疑，而這樣的懷疑會直接影響社統黨本身政權的「值得服從」。所以社統黨在一九八七年十月首度禁止了一部蘇共允許的電影，一九八八年底，更進一步禁止了五部蘇聯電影與三份報刊。^⑥這些禁令引起了黨內外激烈的反對。^⑦

社統黨第三個對戈巴契夫不滿的地方是他對國際關係所謂的「新思維」。這個「新思維」是宣稱和平與人類的共同價值具有普遍性，並把階級放在次要地位。^⑧這個新態度否定了以前的「布里茲涅夫主義」，^⑨這會使社統黨失去他政權最有效的保障。

為了從蘇聯的意識形態理論中獨立出來，何內克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提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說法。^⑩可是東德的領導者已經無法貫徹這個概念，因為：一、他們已經失去了他們的權威。他們所說的「成就」很明顯的與事實不符。二、黨員對黨的領導具有心理上的疏遠。三、四十年來，蘇共和社統黨的意識形態已經是分不開的了。

註④ Hertle, "Staatsbankrott," supra note 38, p. 1023.

註⑤ 此是社統黨政治局內處理意識形態問題的書記 Kurt Hager 一九八七年四月發表的說法，見 *ETU Country Report, East Germany*, No. 2 (1987), p. 6.

註⑥ 一九八七年十月電影「贖罪 Pokajnie」，一九八八年 *Sputnik* 月刊，五個電影之中包括「女性全權代表」與「一九五二之冷夏」。 *New Times* 周刊， *Problems of Peace and Socialism* 月刊。見 Fred Oldenburg, "Die Implosion des SED-Regimes. Ursachen und Entwicklungsprozesse," *Berichte des Instituts fuer ostwissenschaftliche und internationale Studien*, No. 10 (1991), p. 9.

註⑦ *Ibid.*, p. 11.

註⑧ Alex Pravda, "Is there a Gorbachev Foreign Policy?," in Walker Joyle, Hillel Ticktin and Stephen White, eds. *Gorbachev and Gorbachevism* (London: Frank Cass, 1989), p. 114.

註⑨ Brezhnev doctrine: "This doctrine allowed Russian intervention within Eastern Europe to eliminate anti-socialist elements. Needless to say the Russian leadership would identify this elements itself." 見 Robbin F. Laird, *The Soviets, Germany and the New Europ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p. 26.

註⑩ Oldenburg, "Die Implosion des SED-Regimes," supra note 52, p. 10.

東德反對運動的大躍進

如果以林茲的威權政體中的反對分類概念來看，八〇年代的東德，非法反對是被國安部門有效的壓制著；準反對大幅擴張；而半反對也擴大了他的範圍。

對準反對來說，最重要的組織基礎還是宗教組織。包括原有的人權問題在內，共有四個訴求議題出現：

(一)爭取和平的自主性運動。這個運動起因於一九七八年六月東德教育部長 Margot Honecker 宣佈，從新學期起，八年級以上的學生須參加軍事課程。^⑤這項宣佈激起宗教界與青年的反對。他們在宗教的保護下，組成了一個爭取和平的自主性運動。一九七九年北大西洋公約國家的飛彈方案使東德的和平自主運動在西德和平運動的影響下，變成東德第一次大規模的青年群眾反對運動。一九八〇年他們進行了「和平十天」的活動，這些活動和西德的「復活節示威」類似。^⑥政府與自主和平運動之間有方向上的衝突。政府希望自主和平運動把矛頭對準西歐的飛彈而容忍「好」的東歐飛彈。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東德新的兵役義務法使女性爭取和平的運動出現。她們反對政府在戰爭中可以徵召女子的新規定。^⑦社統黨無法壓制這些運動，因為他們自稱東德是「愛好和平的國家」。一九八三年雙方把飛彈駐紮在歐洲後，這個爭取和平的自主運動就減弱了。但部分成員則轉向其他的反對陣營，繼續活動，如 Baerbel Bohley。^⑧

(二)環保運動。起因於東德的環境污染問題。最早的宗教環保運動成立於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九八三年四月這些環保團體進行他們第一次全國環保小組會議，^⑨運動的成員並成立了幾個所謂的「環保圖書館」，發行所謂的「環保報」。^⑩

(三)人權運動。這是歷史最久的運動。八〇年代他們最有意義的組織是「和平與人權的奮起」(Initiative "Frieden und Menschenrechte")。一九八六年他們發行了自己的報紙「介於兩可之間的兩難情況」(Grenzfall)，發行量在五百到八百份之間。^⑪

(四)申請移居西德。一九八二年在馬德里召開歐洲安全合作會議(CSCE)後，東德政府原則允許以親屬關係移居西德。

^⑤ Allen, *Germany East. Dissent and Opposition*, supra note 7, p. 96.

^⑥ *Ibid.*, p. 98.

^⑦ *Ibid.*, p. 109.

^⑧ *Ibid.*, p. 110.

^⑨ *Ibid.*, p. 137.

^⑩ EIU Country Report, *East Germany*, No. 1 (1989), p. 7.

^⑪ Allen, *Germany East. Dissent and Opposition*, supra note 7, p. 162.

③一九八四年有四五、〇〇〇人利用這個機會離開。④直到一九八九年，沒有任何一年超過這個數字，但是因為申請者和獲得許可的人數比例懸殊太大，所以它對社會的影響還是很大。以一九八八年為例，共有五十萬人申請，⑤實際上得到許可的只有三萬五千人。⑥申請者常會受到東德政府的處罰，例如失去原有的好工作，但是這只是造成另一種自主性利益團體的出現。我們可以說，申請移居，是代表對東德社會、對社統黨的失望，其中尤其以青年人為最。

我們如果對這種準反對做評價的話，可以說：一、準反對活動已經從少數人變成群眾運動，參與者包括了青年和關心環保人士等等。二、活動的組織化大幅提高，甚至比較定期的報刊也出現了。

一九八七年起社統黨開始壓制準反對團體，如環保圖書館。可是他們不但沒有成功地分散反對力量，反而使準反對者走向極端化。⑦一九八八年一月，反對者進行示威，要求統治者容忍不同意見。警察抓了幾位參與者，並打算像以前一樣遣送西德，但是被捕者拒絕離開，由此可知他們企圖爭取政變。⑧

對準反對者來說，從東德間諜機構主任 Markus Wolf 提前退伍的意外事件可以證明，在領導階層內必有矛盾存在。而一九八八年起社統黨黨員的人數第一次出現負成長，由此可以得知反對力量的表現。⑨

本章前四節指出，八〇年代的國際形勢、經濟履行、與人民心態都對社統黨不利。東德的國家安全部 (Ministerium fuer Staatssicherheit) 在此時雖然擴編到十萬多名正式的官員，並且在社會各階層中有十一萬的線民，⑩但卻無法有效阻止反對運動的繼續發展。其原因有：一、在社統黨經濟和政治表現越來越差的情況下，人民以前對政治的冷感漸漸轉變為對社統黨的反感，使得可能支持反對者的基礎大幅度擴大。以前國安部以威脅的手段封鎖反對者，而在八〇年代末國安部的行動卻「塑造了」反對者的「烈士形象」，激發社會上一般人民對反對者的支持。二、經濟停滯使得反對行動的「機會成本」減少。一般人認為，社統黨的政權無法符合他們未來的展望，使他們對東德政權的控制完全表現不在乎的態度。三、社統黨的領導人在決策過程中已脫離實際現狀，沒有考慮到國安部所提供的情報，至此人民開始突破國安部的控制。

註⑩ Henry Kirsch,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p. 81.

註⑨ *ETU Country Report, East Germany*, No. 1 (1986), p. 6.

註⑧ *ETU Country Report, East Germany*, No. 4 (1988), p. 6.

註⑦ *ETU Country Report, East Germany*, No. 1 (1989), p. 7.

註⑥ *Ibid.*

註⑤ *ETU Country Report, East Germany*, No. 2 (1988), p. 3.

註④ *Focus*, 1 February, 1993, p. 30.

註③ Oldenburg, "Die Implosion des SED-Regimes," *supra* note 52, p. 9.

四、一九八九年的崩潰

從前節的描述可以得知，社統黨的政權在一九八九年以前已經遭到根本性的削弱。最重要的同盟者蘇聯不但無法提供任何協助，反而因為社統黨的領導階層公開反對「改造」政策，而使雙方關係明顯變壞。

經濟履行部分也使東德人民長期不滿。(參見表六)尤其領導人還是繼續宣傳「東德福利政策之偉大成就」，這種說法使人民對社統黨更加反感。雖然一九八九年東德在消費品方面的供給並沒有明顯的挫折，但是，這是領導者為了不讓生活水準在東德立國四十週年紀念日前降低，再度向國外貸款的結果。一九八九年東德對西方國家所累積的債務總數是四九〇億馬克。一九八九年東德對其西方債權人所該償付的債務與利息，是東德對這些國家出口收入的一五〇%。①這表

註① Herle, "Staatsbankrott," supra note 38, p. 1023.

表六：東德國家生產總額(National Material Product)成長率1981~89年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據國家計劃	-	-	-	4.4% (a)	4.4% (a)	4.4% (b)	4.5% (b)	4.1% (c)	4.0% (c)
官方所公佈的成就	4.8% (d)	2.6% (d)	4.4% (d)	5.5% (d)	4.8% (d)	4.0% (e)	3.3% (e)	2.6% (e)	1.8% (e)
EIU的估計	-	-	-	-	4.4% (1981-85) (f)	<4.0% (g)	<2.0% (h)	1.7% (i)	-
Becher的估計	-	-	-	-	4.5% (1981-85) (j)	4.3% (j)	3.3% (j)	2.8% (j)	2.0% (j)

說明： <..表示小於之意

- 資料來源：
- (a)..EIU Country Report, East Germany, No. 1(1986), p.5.
 - (b)..EIU Country Report, East Germany, No. 2(1987), p.5.
 - (c)..EIU Country Report, East Germany, No. 3(1990), p.3.
 - (d)..EIU Country Report, East Germany, No. 1(1986), p.9.
 - (e)..EIU Country Report, East Germany, No. 3(1990), p.3；但筆者以1981年的物價情況為基礎換算。
 - (f)..EIU Country Report, East Germany, No. 2(1986), p.10.
 - (g)..EIU Country Report, East Germany, No. 2(1987), p.3.
 - (h)..EIU Country Report, East Germany, No. 2(1988), p.3.
 - (i)..EIU Country Report, East Germany, No. 1(1989), p.9.
 - (j)..Becher, "Das Ringen um die Wirtschaftsreform in der DDR," *Deutschland Archiv*, Vol. 23, No. 5 (1990), p.687.

示，東德統治者在經濟方面已經失去了任何迴旋餘地。

社統黨的內部氣氛也令人擔憂，黨員對黨的領導有嚴重的疏離感。黨員認為黨的領導不但不願意承認事實上的危機，而且無法提出有效的政策方針。

在這樣的國內情勢下，一九八九年夏天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更進一步的削弱：首先是波蘭與匈牙利的政治改革終於突破了傳統共產黨的政權模式。一九八九年初，波蘭統治者被迫與反對者舉行「圓桌談判」。六月的選舉，波蘭統一工人黨連一個公平競爭分配的席位都沒有得到。選後工人黨無法組成可讓國會通過的政府，而在一九八九年九月由 Tadeusz Mazowiecki 出任總理。雖然政府中還有四位工人黨籍的部長，但是這個政府卻足以稱為後共產主義的政府。^⑳

匈牙利共產黨中的改革派從一九八九年五月起占上風。五月起匈牙利開始拆除前往奧地利的邊境封鎖設備。一九八九年九月十日更宣佈取消邊界。^㉑

波蘭的例子證明和平政變是東歐國家可行的選擇。匈牙利則是第一個放棄自我封鎖的東歐國家，這給東德人民大量逃跑的機會。

其次是蘇聯對附庸國的控制力日趨萎縮。波蘭出現一個非共產黨政府與匈牙利的獨立外交，皆因蘇聯已無法像以前一樣，同時在幾個同盟國間以軍事行動干涉他國政策。也就是軍事的干涉不再存在。此外，蘇聯較前開放的代表大會選舉後，人民的政治動員程度很高，反對派也在國會中成立自己的組織。任何違反民主化的行動都會激起激烈的反彈，如中共的「六四」。因此蘇聯的領導人不只是不願，且不能干涉東歐諸國的政治了。

一九八九年五月七日的地方選舉，東德領導人對當時的政治局面認知錯誤。因而東德人民利用選舉來表達對政權的不滿，在選舉時領取選票而不投票，並將選票洩露給路人看；某些城市更有遊行和示威活動，比如 Leipzig。^㉒至當天晚上東德領導人卻片面宣布九八·八五%的得票率，明顯的偽造了選舉結果，此舉為反對者提供了一個動員居民不滿的機會，使東德人民進一步發覺社統黨的領導人並無誠意改變領導作風。^㉓

匈牙利開放與奧地利的邊界後，有大量的東德人逃亡到邊境。但是社統黨政治局並不做適當的反應，九月以前也沒有提出任何說明。九月十日後，東德媒體開始埋怨匈牙利的變節，並且指出一切的問題都是帝國主義的力量造成的。東德先是禁止他的人民到匈牙利去旅行，接著十月四日又取消他與捷克間無需簽證的規定。^㉔此時社統黨很明顯的出現「領導無力」的情況。^㉕

註

Jochen Thies and Wolfgang Wagner, eds., *Das Ende der Teilung*, supra note 3, p. 289.

註

Allen, *Germany East, Dissent and Opposition*, supra note 7, p. 175.

註

Jochen Thies and Wolfgang Wagner, eds., *Das Ende der Teilung*, supra note 3, p. 177.

註

or "steering" functions. J. M. Hutchings, "Leadership Drift in the Communist Systems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supra note 34, p. 5.

此時反對者已發覺社統黨領導者的無能，開始建立政黨或是類似的政治團體。例如九月十一日的「新論壇」(Neues Forum)、十月二日的「民主新頁」(Demokratischer Aufbruch)、十月八日的「社會民主黨」(SDP)的成立等等。反對者正利用機會達到他們的終極目標，進行自由選舉。⁷⁸

何內克下台之後，新的領導人也無法恢復政權的穩定，因為反對者動員人民的能力太大。社統黨不但找不到政策改變的資源，也無法防止自己黨內矛盾的爆發。這使得社統黨日趨解體。

在社統黨之外，雖有團體有興趣保持東德的獨立政體，如「新論壇」，但是無法為這樣的計劃提出良好的辯解，人民已把西德視為最可信的選擇。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八日國會選舉時，東德的基督教民主聯盟順利的脫去以前與社統黨的關係，成為西德成功發展模式的代表。東德人民之所以投票給他們，並不是因為候選人的個人因素，而是希望將東德的政治交由西德那些具有權威和經驗的政治家來控制。

五、結 論

東德之所以存在，所依憑的支柱有四：一、蘇聯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二、東德的經濟成就與西德相較還不太差，所以民眾還願容忍東德政權。三、社會主義的未來幻景似乎是可信的。四、反對範圍較小，安全體系足以有效控制。在此情形下，社統黨可以把民族問題藏在底下。七〇年代後半期開始，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動力不足，這四個支柱紛紛瓦解，蘇聯再也無法把他的附庸國封鎖在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內。東德領導人所採取的經濟政策失敗，雖然何內克以貸款手段延遲承認失敗的時刻，但是社統黨只能欺瞞國外的觀察者，卻不能長久欺瞞它的人民。承諾與事實間的差距日益拉大，政權的可信度自然日益減縮。八〇年代反對運動的擴大，顯示出東德政權的合法性危機。一九八九年東德面臨人民大量逃走的急迫危機，統治者卻不能作出反應，東德政權的衰弱才明確地「洩露」出來。對東德人民而言，共產政權崩潰後，加入發達的聯邦德國是最理想的選擇，因為他們已經不願再進行新的社會實驗。

政治學者之所以沒有預測到東德崩潰的時刻與速度，原因似乎在於政治學者雖然知道社會主義的統計數字並不可靠，但是在東德這個例子上，還是被騙了。一個政權經濟履行的標準不只是數字的統計而已，更重要的，可能是人民在實際生活中

註⁷⁸ Gottfried-Karl Kindermann, "Impact of the Changing Communist World on East-West Relations in Europe: The Case of Reintegrating Germany," in Lin Bih-Jaw, ed., *op. cit.*, pp. 102f.

的真正感受，以及人民對生活的期望和期望的達成的可能性有多少。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間，東歐共產政權已經進入 Samuel P. Huntington 所謂的「適應期」(adaptation)，意識形態已經不再重要了，經濟方面的履行能力取代了意識形態的宣傳。⑨然而因為歐洲國家間的交流開始，東歐民眾自然會把自己的生活情況和西歐國家相比，其中尤以德國為最。當人民把經濟發展的履行能力和政治體系連在一起思考時，共產政權在經濟方面的弱點早晚會暴露出來。因此我們可以說，東歐人民之所以爭取民主，並不是因為民主的理念，而是因為消費水準的優勢。他們認為，政權的改變，可以直接導致生活水準的提高。⑩而共產黨黨員也不例外，如果共產黨無法滿足他們消費方面的願望，他們不願意支持此政權。

*

*

*

⑨ Samuel P. Huntington,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s," in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Clement H. Moore, eds.,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pp. 32ff.

⑩ Schoepfin, "Das Ende des Kommunismus," supra note 10, p. 75.